

唐代山水田园诗背后的城市意象

侯长生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唐代山水田园诗作为诗人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情感表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而且反映了城市作为人工设计的场所与自然空间及乡村的非设计空间三者的联系,从山水田园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成长环境、成长历程对其影响以及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态度。

关键词:山水田园诗;城市意象;唐代;城市;乡村;王维;韦应物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1-0027-05

山水田园诗自魏晋南北朝兴起,作者历代不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俨然一大宗派,诗写山水,情寄山水,已成为对山水诗进行全面审美观照的体验。从山水诗的发展历程来看,魏晋南北朝时的山水诗写作与盛唐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感悟。魏晋时期的山水诗人出身于高门士族,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日常生活以城市为中心,逐渐形成个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盛行谈玄说理的风气下,他们的山水观照是试图以自然之心、自然之眼寻找玄理之门径,是借山水实现“目击道存”的一种表达方式。盛唐时期的山水诗人则不同。当时以科举考试为选官制度的体制,为中下层庶族提供了走上政治舞台,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很多耕读传家的人自乡村或小镇走进了大城市,耕读所在地的自然山水是他们成长期间最深刻的记忆,进入城市,特别是长安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环境中,一切都是新奇的。由于这种新奇与自身的深刻记忆存在着极大的不和谐,因此,无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是得意还是失意,总会有淡淡的“乡愁”浮上心头。无论是李山甫的“年年今日谁相问,独卧长安泣岁华”,还是常建的“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或者李商隐的“滞雨长安

夜,残灯独客愁”,都一次次道出了长安带给他们的思乡之情。山水与田园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远不止是终南捷径或富裕生活给予的游山玩水乐趣。从此角度入手,再看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之作品,会发现乡村生活记忆与现实城市生活的矛盾构成的张力,使得山水田园诗并非一片纯洁明净,相反倒是留下了试图挣扎和摆脱城市印象的痕迹。历史上真正的隐士,特别是与城市完全绝缘的隐士,要写出感人至深的山水田园诗恐怕还是有难度的:第一,所谓“感人至深”的受众来自于城市文明的接受者,没有城市文明的熏陶和洗礼,没有城市生活的对照,山水田园生活的恬然自安、孤冥静寂、悠然淡泊的美是无从欣赏的,缺少城市经验的人找不到内在张力的理解方式;第二,无论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还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都绝不是纯粹的景致描写,它所带有的独特韵味是一种对城市的反抗,有一种静寂的弹性,是自身对城市环境不兼容的自述。

一、物质空间差异的心理波动

城市与乡村给人印象最大的差异在于有意规划

收稿日期:2013-12-13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13X119)

作者简介:侯长生(1972-),男,江苏丰县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和随意配置的不同。在城市里,高密度的人口、功能区划的界定、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区域等都是经过规划安排。而乡村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随意发展,聚集在一起的村落也表现了无序性的特点。唐代长安城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文帝在西汉的旧都上建起了自己的都城。589年,新都城大兴的面积已经扩展到9.25平方千米,隋文帝决定要修建一个以都市为中心的新的都市区域,最终大兴城占地面积8400平方千米,成为19世纪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代继承的大兴城,即长安城,不仅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而且城市规模和布局也都具有领先地位。城市的布局是非常规则的矩形,西市和东市位于城内,东西大街将城市分成拥有宫城、衙署和贵族府邸的北半部分,而南半部分则是普通人居住区;沿着南北大街,分成36个里坊,东西大街则分成25个里坊,其中还包括两个大的市场。另外在城市里还建有40座官宅、5个皇子宫殿、7个公主宫殿^[1]。这样规划清晰而又层次鲜明的城市面貌与乡村的随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卢照邻诗中所写的长安是“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意象纷至沓来,却很难形成理性的、明晰的城市轮廓。在诗人笔下,长安的富庶与繁荣是令人激动和振奋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表现了都城的雄伟壮丽以及无可比拟的政治地位;“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卢照邻《长安古意》)^[2]写出了大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奢侈淫靡;“红尘白日长安路,马走车轮不暂闲。唯有茂陵多病客,每来高处望南山”(张元宗《望终南山》),描绘了长安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心态差异……城市市民以住宅为容身之所,其生活亦以城市中的各类建筑或建筑的延伸物为依托进行,都城的壮丽情形和各种生活方式都在各种物质空间中得以体现。乡村生活则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遮蔽风雨的栖身处,二是衣食之源的土地。这类地方绝没有城市那样的系统规划,屋舍因地就形,田地亦随意为之,能达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就是《桃花源记》的理想境界了。约翰·里德在《城市》一书中提到“我们塑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我们”^[3]。同样,唐代的人们在创造繁荣城市生活的同时,自身也被城市塑造出新的特性,而诗人们勾勒出自己认知

的城市特征。

因此,城市对人格特征的塑造要远远大于乡村的自由生活,物质生活空间的差异对那些从乡村走入城市的人会形成强烈的冲击。当处于艰难谋生或激烈竞争的阶段时,这种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一旦生活略有缓解,物质空间的强烈对比使那种原始的乡愁或者返回自然的心理无限放大。形之于诗后,对于深受城市文明影响的人群,有没有乡村或山水田园生活体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都可以从这类诗歌中寻找到的心灵归宿,以实现对城市生活种种不满的逃避。“诗者,志之所之也”,于是借诗歌来抒发个人胸中的郁塞和苦闷便成为士人常见的方式,在叙述的话语中直接触动人们心灵的是与现实天壤之别的恬静田园生活。

如果没有意外或者必须要做的事,农耕社会的人不大愿意做出背井离乡的选择,但社会的发展还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城市^[4]。每当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古代社会无法养育超量的城市人口时,“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等口号就会大行其道。乡村与城市的距离也许并不遥远,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却极其显著,居住在城市与乡村的人之间的心理差距同样存在。唐诗中“旗亭画壁”轶事中,称呼对方“田舍奴”以为戏谑可见其情形。

二、山水诗对城市的反抗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的城市可能有诸种繁华与迷人之处,亦不足以有特别精致、细腻的城市规划,但无论哪种城市类型都会与基本无序的乡村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诗人与城市融合关系的差异,其所创作的山水诗中亦隐含着对城市态度的差异。沉浸于自然界的优美恬静时,储光羲这样描绘着天然无序的情景:“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钓鱼湾》);投入乡村生活时,孟浩然极力表现出自己从中获得的快乐:“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然而,储光羲与孟浩然是迫不得已才选择做隐士,科举场上的失意使城市成为他们努力追求、向往而不可获得的东西,于是转向自然寻求解脱,山水诗中的自然并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一种排遣苦闷的精神寄托,无序的自然山水并不能成为他们情感的真正归宿。

无序往往象征着没有经过人为修饰的自然。真

正对自然的喜爱,并不是一定要排斥城市,而是能够放下城市,发自内心的关注自然风光。王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后期的诗歌鲜明地表现了对山水田园的喜好和对自然主题的推崇。

王维,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后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唐代著名诗人,15岁离开家乡到长安,很快就以卓越的文学艺术才能而闻名京城^[5]。17岁所作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很快成为脍炙人口的思乡怀人名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时王维已到长安两年,浓浓的亲情是他对家乡化不开的思念。“异乡”二字透露出他对长安城的疏离,没有将自己融入到这座城市中。登高怀远也许正是他此刻的行为,但在城市里登高对他来说同样是陌生的,只有家乡的高地才是他熟悉地方,因此他宁可用想象的方式回到自己熟悉的情境中去,借用兄弟对自己的怀念,再次验证自己毫不留恋当下的生活。王维的山水诗,体现出对城市的摆脱或者寻求一种孤寂的独处境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和“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这两首诗是王维田园组诗《辋川集》中的名篇,它们犹如一幅清澈的山水画,表现了辋川一带优美的风景,表明了作者对山川景物的流连忘返。研究者多从王维好禅的角度来赏读这些诗歌的意境,强调作者创作了空明澄静的幽林之景,具有情虑皆空的思致和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可是,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城市生活的体验,没有受过城市文明熏陶,没有处于城市的嘈杂和喧闹的人群中,而是一直生活平淡宁静、波澜不惊,很难会对静谧的环境有这样独到的眼光和深刻的体味。

王维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高祖、祖父等都曾为宦一方,其父王处廉终于汾州司马任上。只是按照城市的发展规模来说,王维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始终处于小城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其他城市与封建帝王集全国之力建设的都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城市功能上都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物质空间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心理。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特别提到,道路、区域、节点、边界、标志物是城市意象的五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形成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即所谓的城市意象。人对陌生城市的恐惧或者不安就来自于这些不清晰的意象,人对于没有清晰意象的未知区域会自然地生出心理恐惧^[6]。不论古代的城市与现代文明下的

城市有多大的差距,城市意象的五大要素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王维从小城镇甚至乡村走进棋盘般井然有序而又摸不清楚的道路,看着高大雄伟庄严的帝王宫室和王侯贵戚们的高宅大院时,一定会产生某种紧张和焦虑。他对这样的物质空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尽管他才华过人,并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在没有任何传播途径可以将城市意象以生动逼真的形象呈现给乡村中的人们时,城市一定会让一个初来乍到的乡村少年感到紧张。即使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适应,他可能会渐渐熟悉城市的物质生活,而要融入城市的精神生活,必须首先融入城市人群。城市是王公贵族的天地,新旧贵族与刚刚进入城市的读书人之间存在隔阂,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之间的这些问题渐渐积累在心里。即便像王维这样在贵族群中较早得到赏识的人,内心也未必认同达官贵人们的生活,也未必能真正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还应注意,王维在诗、书、画及音乐方面的高度艺术成就,证明他是一个天份极高的艺术家,无论任职尚书右丞或更高级别的官员,都不会改变他的艺术家气质。富贵生活也许对艺术家的从容创作有所助益,但真正的艺术家不会把功名富贵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和追求,所以在旁人看来,王维晚期的日常生活过得极度惬意是在物质生活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的精神生活追求。因此,人们对于他没有沉迷在优游富贵中,而选择了隐居辋川、焚香坐禅的行为有各式各样的猜测和解释^[7]。

如果只从创作来看,王维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只是作为一个城市生活旁观者冷冷地审视着它。一旦回到自然的山水田园中,他的热情和激情就会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王维最关注的山水田园是一种与城市具有强烈对比的山水田园,他这类诗多是在终南山半官半隐时的创作,而不是对家乡山水田园的描绘,更不是人迹罕至的自然。终南山和长安城在唐代诗歌意象中是密切相关的,除了士人们为了仕途而走“终南捷径”外,终南山与长安城遥遥相对,成为山水与城市的绝佳实景题材。祖咏的应试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终南望余雪》)。据说祖咏因为此诗“意尽”,不肯画蛇添足以符合规定句数,没有能够通过进士试,反而让此诗更加引人注目,受到更多的好评。诗中所写显然是从长安城中远望终南山的情景,长安城与终南山的空间位置相距甚远,但它们在

诗中成为了完整的整体。王维在终南山的隐居细究起来也只是对城市的回避,辋川别业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他的衣食住行都不能没有长安城的供给,在他的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形象绝对不是自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林叟是山野之人,他们不存在隐与不隐的选择,因为他们本身就不为人知。王维却不同,他是高级官吏,又是名闻天下的诗人,他的“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恰好写出了自己城市人的身份。虽然说“无还期”,但显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如果真的“无还期”,恐怕他不能如此悠闲地作诗了,如此惬意地赏读自然,所以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所属的群体中。道理很简单,没有城市,没有城市人口的喧嚣,隐士的生活也就不存在了。他用诗歌反抗自己生活城市的环境,用今天的城市学观点来说,其实他是希望城市变得更美好。

三、山水诗与城市的谐调

山水田园诗所咏的自然是一种与人工设计的城市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非是绝对的。在某些诗人身上,山水诗与城市可以和谐,山水成为城市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情境,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活世界。

事实上,当城市生活让诗人充满希望和憧憬时,他们眼中的城市风光与自然美景并无显著的差别。“长安九城路,戚里五侯家”(皇甫冉《长安路》);“长安雪后似春归,积素凝华连曙辉”(岑参《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李贺《沙路曲》)……这些诗句表现的不仅是作者对城市的观感,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热情。然而,由于诗人的感情表达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他们对城市失意和无望时,眼中的城市便成了另外一副面孔:“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手环堵”(杜甫《秋雨叹三首》);“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满腔悲愤和失落溢于言表。而王维作为久居长安之人,其涉及城市的作品题材与风格原本多样,对城市的描述也有着多面性。在山水诗中,他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排斥和疏离,而其他题材的诗歌中,他对城市的态度也曾呈现过热情友好的一面。“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

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诗开头用渭水、黄山、秦塞、汉宫来明确长安城的地理位置,阁道是悬空架起的天桥,专供皇帝车驾出行使用,帝城凤阙高耸入云,茫茫春雨中绿树掩映着万千人家。虽然诗中难免有应制诗惯用的谀词,但他所描绘的离地架设的空中阁道、高耸的帝王宫室、参差错落的万户人家,都是真切的实际景象,他以诗人兼画家的手法,既写出了帝国全盛时期长安的神采,也给世人呈现出一幅阔大美好的帝都画图。那么,这种两面性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只要比较王维与韦应物的山水诗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成长于长安城的韦应物山水诗与王维山水诗有着怎样的不同。自然环境是自然的,它并非一件艺术品^[8]。只有经过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才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对象。韦应物的诗风恬淡高远,以擅长写景和隐逸生活而著称。他的诗更多地表现了对不受人类侵蚀的自然的无限向往,山水风景带着与生俱来的随意,而他自身也在这美丽的自然面前显得十分的惬意,完全没有城市让人产生的焦虑与紧张。在47岁领滁州刺史前,韦应物基本上是在长安和洛阳度过,所以城市对他而言基本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是他感到熟悉而亲切的事物^[9]。山水田园风光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缀品,偶尔涉足的即兴游览,会让他以平和的心态去发现山水的宁静和自然之美,由于这种发现不会构成与现实生活的冲突,所以二者之间可以平稳和谐地相处。如《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是行迹。”山中道士是作者想念的对象,全诗一片萧疏淡远的景致,前人评为“一片神行”,然而韦应物感受郡斋的“冷”与山中道士生活环境的清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并没有像王维那种羡慕“樵夫”或“林叟”生活,有的只是旁观者的理解和欣赏。又如“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这是韦应物的山水名篇,当时他正在滁州刺史任上,春游西涧时恰逢春雨,野渡无人、小舟闲泊,淡泊宁静之意呼之欲出。且不论该诗是否另有政治深意,仅就所写之景、所述之情来看,作者对山水的爱恨与城市生活并没有明显的疏离,从官居到野渡,二者并不存在取舍去就的选择。再看王维的《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鸣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乡村的生活情景

和悠闲状态是王维少年时期的环境印象,这种环境对他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他的“即此羡闲逸”不只是对田夫们一时“闲逸”的向往,而且是对整个田家生活方式的憧憬。

韦应物生在长安、长在长安。天宝十年(751)他在“三卫”任玄宗侍卫,同时入太学附读。在此期间,他“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桴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城市给了少年韦应物从事种种荒唐行径的条件,甚至当他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后,居然也逃脱了应有的惩罚,最后还做了皇帝的侍卫。对韦应物来说,城市生活是他喜爱的方式,也许他也会对城市有所不满,可是他在思想深处与城市并没有隔膜。因此,他的山水诗歌也表现出与城市的融合无间,他的山水诗背后是平静、熟悉的城市生活。

四、结 语

凯文·林奇指出,主观性在环境意象生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因如此,诗人身处城市与山水田园两种环境中,强烈的环境对比成为促进山水田园诗发展的一种动力。通常认为,山水田园诗是与城市对立的一种生活反映,然而易被忽略的是这种对立中也存在着统一。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反其道而行之”也是一种借鉴,唐代山水田园诗在致

力于描摹、书写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时,极力摆脱城市生活留下的印迹,却总是不由自主地使城市的种种面目呈现出来,证实了山水诗与城市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实际情形,也说明了山水田园诗中蕴含着对城市意象的另一种“仿写”和借鉴,使得山水田园诗背后的城市意象隐约可见。

参考文献:

- [1] 阿尔弗雷德·申茨. 幻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M]. 梅青,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 [2]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3] 约翰·里德. 城市[M]. 郝笑丛,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 [4] 马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M]. 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5] 王维. 王维集校注[M]. 陈铁民,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6]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 何晓平,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 [7] 王维. 王右丞集笺注[M]. 赵殿成,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
- [8] 孙逊, 杨剑龙. 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9] 韦应物. 韦应物集校注[M]. 陶敏, 王友胜,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City image behind landscape pastoral poetries in Tang dynasty

HOU Chang-sheng

(School of Literary Arts and Communic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Landscape pastoral poetries in Tang dynasty, as an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a mode of life which was aspired to by poets, not only reflect the authors' political views and value pursuits, but also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ity, which is a place of artificial design, natural space and the unde-signed space in countryside. From landscape pastoral poetries, the poets' growth environments, experiences, the influence of them on their poetries, and the poets' attitudes towards urban life can be revealed.

Key words: landscape pastoral poetry; city image; Tang dynasty; city; countryside; WANG Wei; WEI Ying-wu

